

綜合討論 (二)



劉人鵬（主持人）：大家好，兩天的研討會現在要到最後的綜合討論。大家聽了一整天演講，現在四位講者一起坐在這邊，大家可以就四者之間的對話提問，或者你今天在各場次之間還有一些未竟之言沒有問到的問題，這個時候都可以提出來。我們現在就開放大家提問。

積丹尼：嚴老師講的賣淫好像很好玩，可是我們都是知識分子，我們要怎麼下海？

與會者：我想請問何老師和王蘋，我們大家也可以一起來思考，就是從早上何老師講性別政治的年齡轉向，下午王蘋提到因為白玫瑰運動和Z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這樣的組織，造成性權上的嚴重倒退。我就在想，在運動策略上我們可以怎麼辦？尤其面對很民粹的白玫瑰運動這種動輒可以號召上萬人走上街頭的情況，在運動上我們有沒有什麼可以思考的？謝謝。

與會者：我是想問何春蕤老師有關年齡政治的問題，面對性侵害的受害者，如果他們真實的感受是真誠的不舒服，很痛苦的感受，那要怎樣處理這部分？

陳容萱：你好，我是從紐西蘭剛回來的學生，因為離開台灣已經三年，我這次回來最大的印象就是台灣好像開始有一種全民攻打「小三」的氛圍。我在猜，可能因為不久之前的連續劇「犀利人妻」，透過偶像劇這樣的東西，把主流的性別意識深入到青少年會看的節目裡頭去。其實報紙每一版都得到小三這個名詞，公車站或雜誌上也有「抓猴」（捉姦）的廣告，而且還是由女性來執行。我只是在想，是單純一部連續劇造成這樣的狀況嗎？還是有其他社會現象造成這樣的狀況？以前有些連續劇也曾經有過一段這樣的氛圍，可是現在怎麼又起來了？是不

是一種集體對「一對一」體制不穩定的焦慮？

潘綏銘：我給何春蕤老師提個問題。她講的是年齡的問題，可是我們國內在二〇〇〇年、二〇〇六年、二〇一一年三次全國調查裡面，關於性騷擾、被迫的性、或被強姦，男性報告的比率都比女性多。這個現象在台灣有嗎？或是討論過嗎？我們到現在不敢寫這方面任何一點的文字，就是因為不知道要怎麼解釋這三項指標男人受到陷害的都比女人多，不知道在台灣有沒有人討論過？謝謝。

劉人鵬（主持人）：好，我們先請發表人回應，下一輪再繼續提問。

王蘋：我先回應一下，我覺得想要有自己的行動綱領，至少要有能力把一個事情辨識清楚，然後也應該能夠在我們的行動上問自己一些問題，譬如說，我們的行動是不是有回饋到運動本身之類的。我講的很抽像，但是我想說的是要在具體行動去展現。針對現在普遍的、恐性的、民粹的一些行動，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有我們自己的行動策略，而不只是坐在那邊看，然後很擔心。我覺得那是不夠的。你問我們的行動是什麼？可是我認為這不能是我想要這樣做，然後你們跟著我做，我覺得不太可能，但是我覺得我們要把事情辨識得更清楚。

何春蕤：有關於像白玫瑰這種民粹運動的策略，我最近這一兩年的做法是，在沒有深刻理解他們所動員的情緒是什麼，沒有理解到那樣一個強大的情感力量從什麼地方建構起來，沒做這些工作之前，我覺得是很難想要怎麼打的。換句話說，策略，不是看到某件事情發生就立

刻做出直接回應，我們需要多多了解，謹慎思量，我們的回應才不會誤打到別的東西，或者打錯方向而形成一些我們日後不願意看到的後果。我目前對於「情感」這個議題的關注，主要是參考佛洛伊德以及 Wilhelm Reich 對於人格結構的形成所提出的理論，觀察那樣一個透過家庭結構、親密關係、社會形態、文化氛圍所形成的人格結構和情感會怎樣使得人們在遇到爭議性的議題時採取保守退縮的反應。另外，我同時也開始研究性恐慌，這種民粹的現象其實不是只有台灣出現，當然台灣的民粹有台灣的政權更替、民主運動所形成的民粹特殊性，至於這個特殊性是什麼，我還沒有完全搞清楚，但是我會去看其他國外學者對於性恐慌的分析，參考她們提出的解釋。作為學術知識分子，我需要往這些方向去做研究，去觀察，去分析，多多對我們所面對這個怪獸有所了解。比較有意思的是，其實白玫瑰運動也已經和原來形成連線的宗教保守團體之間產生分裂，本來勵馨等團體和白玫瑰一起連手炒作兒少保護，但是白玫瑰的民粹衝得太厲害，恐龍法官和恐龍法律的說法有可能徹底挫折司法體系的權威，而勵馨她們從一九九〇年代搞《反雛妓法》時就和一些保守的司法人合作愉快，現在當然不能坐視司法人受傷，所以現在勵馨和白玫瑰之間也拉開了某種距離，這也是一個很值得觀察的方向。

至於性侵害的感受問題，我想你大概要問的是，在性解放高舉愉悅的建設性力量時，性侵害的可怕感受到底要如何處理？讓我先說明一點：性的遭遇當然可能牽涉到不舒服或者甚至痛苦的感覺，這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任何性經驗都可能有不舒服或者痛苦的感受，不是只有性

侵害才獨有。畢竟，就算是跟你所愛的人一起，也有可能雙方在性方面無法配合而產生一些複雜的不愉快感受甚至痛苦，即使夫妻之間，也可能因為意願或不和而發生性侵害。性，就是一個蠻難搞的事情，重要的是，能不能表達溝通，能不能尊重意願。

我想你可能注意到，我沒有輕易的使用「性侵害」這個名詞，我剛才用的是「性的遭遇」(sexual encounter) 這個說法。因為我們現在面對了一種社會氛圍，在這種社會氛圍裡，性的遭遇主要被描述為「侵害」，結果：許多小情侶的你歡我愛現在都因為年齡限制而成了「性侵害」，兒少的相互身體探索也因為年齡限制而輕易被當成「性侵害」，男女朋友兩情相悅的活動會在發現一方劈腿的憤怒下變成「性侵害」，年輕人的性生活在被家長震怒追問時也轉變為「他強迫我」因而構成「性侵害」，刑法第十條的定義更擴大解釋使得兩人身體接觸只要牽涉到性器官就構成「性交」然後很輕易的被當成性侵害。而且我們社會還透過專業、透過社工、透過心理諮詢，引導個人用「受害」來框架她們的經驗，讓不舒服和痛苦成為主導的情感。這些都是近年婦女團體和兒少保護團體攜手修訂《刑法》和《性侵害防治條例》而造成的後果。這些法律所形成的氛圍，不但擴大了性侵害的定義，也強化了性遭遇的可怕氛圍。我想要講的就是，近年來，所謂「性侵害」的文化意義和效應一直在被強化中。

其實，強姦長久以來已經就是我們文化加碼描述的場景，現在更是以最可怕的情境來塑造我們的印象和情感，形成非常固定的內涵。但是我遇到過一些女人，在她們口中，即使是經歷

過強姦，有些震驚和衝擊，但是在情感上她們都沒有容許它持續形成太大的傷害。畢竟，被人搶劫、遇到車禍、東窗事發，都可能留下震驚和創傷，會有惡夢、恐懼，但是人們總是要慢慢克服這些，回到正常一般的生活裡。這些事情的情感建構，完全比不上我們社會對性侵害的強大情感建構，這可能是來自貞操情結所帶動的文化想像，但是諷刺的是，它也構成了很多人又愛又怕的性幻想。

所以當我們思考性侵害的「可怕」經驗時，也不能忘了，那種「可怕」不見得全然來自某次特殊經驗，而有很大成份是預先就被社會文化調教瀰漫周圍的。所以到底「傷害」是什麼？我的回答方式是，傷害跟我們的社會文化腳本的調教有關，跟我們的社會提供的、能夠描述經驗的方式有關，跟我們習慣性規範人要有怎樣的反應有關。因此「個人的感受」是一個值得多深思、多探索、多了解、多表達的東西，痛苦也好，愉悅也好，往往都是複雜的、矛盾的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這樣說來，認為性侵害受害者必定會有某種感受，只有某種感受，或是必定會有某種反應，那可能都是太過簡單的看待人的經驗了。

這也連到「小三」那個問題。我們作為文化的產物，常常受到社會制約，對於特定經驗都有特定的說法 and 想像，性侵害如此，劈腿也如此。我們的文化也提供一整套一整套的語言和情感，讓我們每個牽涉其中的人都照樣做出固定的情感回應，要是偏離主流的慣性模式，例如被性侵犯卻沒有痛不欲生，被劈腿卻沒有咬牙切齒，就會被別人質疑是不是有病還是冷感。而社會

最尖銳的矛盾在哪裡，往往電視劇就會集中在那裡，像台灣前幾年連續劇最喜歡做婆媳衝突的戲，那反映了婆媳權力關係正在動盪，媳婦開始力量壯大，過去只有婆婆兇、媳婦可憐的戲，現在則也出現很多媳婦鬥贏婆婆的劇。台灣也不是從現在才開始打小三，「狐狸精」這個名稱就顯示它有淵源流長的歷史，只不過現在，小三這個名詞的意義不都是負面的了，甚至大陸的小三還成立「三情網」，讓所有的小三都可以分享經驗，學習維護自己的權益，也學習怎樣可以做到不失敗的小三之類的。小三的主體性越來越明顯，相對的，大老婆也越來越強勢的捍衛自己的領土。這方面的爭戰越發反映社會矛盾和一對一夫妻關係的不穩。

潘老師說的男性被性侵害或性騷擾的數據，我沒有聽說過，大陸會有這樣的數據出來是怎樣的原因，我也沒有辦法解答。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就是性騷擾和性侵害的觀念越普及，就一定會出現越多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案子」。像性騷擾這個法條在台灣設置，對女性主體的第一手經驗賦予了崇高的地位，妳有任何的不舒服就算是性騷擾。問題是：這個不舒服是什麼？是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中感受到的？我有一次跟一堆女人談性騷擾，她們說如果對方是金城武，那就不是性騷擾而是對她們有意思，但是換了一個禿頭中年男人，那就是性騷擾。這顯示我們如果只用自己的感受去描述行為，很多時候會有其他的色彩和力道在沒有加以反省的情況下形成冤案，「成見」很容易就化身為「感受」表達出來，而感受則被人當成真實的心靈的，因此冤案也就很難翻身了。另外，很多兒少的性侵害、性騷擾案子是用布娃娃引導問出來的

，這種高度被成人控制和詮釋的程序很有問題。一九八〇年代美國加州曾經有個非常有名的案子，一個幼兒園的園長母子被控告猥褻園中的兒童，社工人員也用布娃娃向孩子收集證據，但是後來卻顯示是誘導辦案，最後雖然翻案，園長一家也都毀了。目前的極端兒少保護和社會氛圍，使得性侵害和性騷擾這兩個名詞之下包含了太多太寬廣的東西，所以數據是必定會增長的，因為就是被這些概念生產出來的案子。

李銀河：我想補充一點，「白玫瑰」這件事我也是剛聽說的。傅柯有一次在說起取消自願年齡線的時候說：「難道沒有十歲的兒童自願投入成人懷抱的世界嗎？」他說只要是在兒童不反對的情況下就不應該有任何的懲罰。我覺得這應該可以成為咱們處理兒童性侵時的一個原則。另外，我想說幾句小三的事。小三在大陸很有意思，有個連續劇叫「蝸居」，是被官方禁播的，禁的理由是兩個：一個是它談到了住房問題，就是住房成為房奴，官方怕引起公眾的騷亂，看了這個劇以後就對住房的問題更生氣。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因為它正面描寫了一個小三，這個小三很清純很無辜，劇中那個官員愛了她，最後她也跟那個官員分開了，也沒要他的財產，但是官方可能覺得對小三太肯定了，就是怕大家學樣，所以把這個劇禁掉了。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小三在大陸真的是個大問題，但是小三和二奶我都是很反對的，傳統舊中國是一夫多妻的，中國一夫一妻制只有六十年光景，我覺得從男女平等角度真的應該反對小三和二奶，這對女的很不公正，因為這個女的對你百分之百，你只給她百分之五十，我覺得從男女平等

的角度來說應該是要反對的。所以我不太理解吳敏倫教授說二奶合法化是一個怎樣的角度，另外，我覺得小三在未來是要激起公憤的，因為中國現在出生性別比是一百二十比一百，就是一百二十個男嬰比一百個女嬰，大概二〇二五年就會有三千八百萬男性根本找不到女朋友的，然後你還一個人佔兩個、佔三個，怎麼不會激起公憤啊？

嚴月蓮：對於那個想加入賣淫的朋友，我不知道台灣是怎麼樣，可是我在台北住的飯店、我看的報紙裡面都有廣告，假如你真的要的話，就去登廣告吧。自己定價格，先去做市場調查，到底價格是多少。

劉人鵬（主持人）：好，我們先來第二輪提問。

王顯中：我想補充一下，剛剛何老師說的大陸的「三情網」，它網站標題下面有一個很給力的口號，「沒有拆不散的家庭，只有不努力的小三」，這個主體位置是很有力的。然後我覺得好像在這個討論裡面沒有聽到一個軸向，我想試試看把它拉出來，我特別注意在李銀河老師分享的時候提到中國大陸某些女權主義者會不想被描述為女權主義，會認為那是西方的東西。可是我覺得在台灣反而沒有這個現象，當然中國大陸的現象大概有它獨特的問題，譬如說面對殖民的強權，它會發展出中國的特色，對「民主」、「性別」這些關鍵字會有一些抵禦的作用，但是也反而導致內部在這些方面的發展有點困難。可是台灣的狀況反而是，一方面我們沒有這種第三世界認同，沒有這種被殖民的認識，所以不管是良婦的或者是主流的女性主義者，她

們所引介的西方資源其實是一種「女人中心主義」，然後跟另外兩種理論很容易結合起來。一種當然是「年齡歧視」，就是把未成年的女人看成是「非人」的或者是「次等人」的，特別是在選擇權或是性工作的討論上，這種論述就容易出現。第二種容易接合的論述是則「種族中心」的，在知識上面把西方女性經驗普遍化，看成是很容易移植過來的，譬如在講到性工作的時候就移植對於弱勢的想像。我想九〇年代台灣可能沒有這麼多本地素材，大多數都是移植西方經驗的，但是我們現在如果要重新清掃或者是回過頭來去看這過去十幾二十年來被主流女性主義者所使用的這套理論，那麼要怎麼樣去挖掘出這些東西跟西方的關聯？中國大陸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些好的、或者不一樣的經驗？她們是怎樣的反思一方面要實踐這個東西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抗拒或是抵禦這些理論裡面的殖民性質？好，這是我的問題。

與會者：我想問一下，我是韓劇迷，有一陣子喜歡看「我們結婚的事」，還有一些綜藝節目跟偶像團體，我想問嚴老師，其實有很多行業也可以賺很多錢，現在經濟又不景氣，那這個行業裡的姐姐們有沒有想到要培養第一專長？還有，她們的收入可以買得起房子嗎？

林秉君：我有點緊張，我想講一個心得，這兩天我都有參與會議，我們談了很多政治的事情，其實性的政治是行為管理的一種文明模式，這個政治的過程決定了我們的體制，這個體制則是關於文明裡面的物質供需，身體的供應跟需求的一些管道也都是由體制決定的。我們的體制決定了我們得到什麼樣的經驗，這些經驗都會影響我們所有的認知，這就是一個互相影響的

過程。性在這裡面變成一種身體的需求，但是每個人都有性器官，每個人看它的方式都不一樣，是多元的，有些人討厭它，想除掉，有些人擁抱它，有的人覺得它應該被治理等等。大家想法很多，一切都很複雜，所以才會想要對性的管理，現在我們面臨的困境就是，因為有管理，就會有自由的箝制。我感覺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找到最無害、最符合所有人、所有群體的人體工學的妥協，這個妥協當然不是我們的野心所在，但是是一個可以預期的結果，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在其中拓展跟爭奪吧，這是一個關於權力的事情。然後要謝謝幫大家打下這片江山的各位前輩和運動者，如果沒有你們，我們就沒有今天。

與會者：今天李銀河老師講到關於民眾調查的部分，好像中國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態度現在比較開放了一點。這讓我開始想一個問題，我觀察我身邊的人，問他們的態度，他們都會說「我接受同性戀」，「我接受性工作」，但是……就是說「我接受同性戀者，但我不接受3P」類似這樣子。感覺起來，他們認同的是概念或意象，然後把真正主流的意見放在但書裡面，聽起來好像有對比較邊緣議題讓步。那我就在想，當邊緣議題聲浪越來越大，向主流招手時，這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區隔？

鄭揚宜：首先我發現一個奇妙的偶然，就是昨天綜合討論台上都是生理男性，今天綜合討論上面全都是生理女性，不曉得這代表什麼，只是偶然嗎？接下來，我有一些比較屬於研究方法衍生出來的問題，想要請教李銀河老師。昨天潘老師提供給我們「初級生活圈」的研究架構

，我覺得非常有趣，它可以解釋很多事情，提示我們怎麼看資料。不管潘老師或李老師，都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去研究資料然後作出解釋，可是剛剛從李老師對於小三的態度，我發現一個我想問的問題：如果我們都是從現實出發來看待現存的狀況，推論出我們需要的答案跟結果，那麼談同志或是婚姻，雖然推出來的結果好像是一樣的，但是推論的過程卻出現了我們沒想到的說法。問題是，如果老師根據將來人口比率會失衡，所以認為小三不可以被認同，那麼何老師也是觀察社會的現實，推論出有複雜的情感模式存在，不能一體而論，不能說只是因為人口比例失和、性別比例失和，就不讓小三出頭。面對這樣的質疑，面對同樣的社會觀察作出不同的解釋，李老師妳會怎樣去看待不同解釋？

甯應斌：我想顯中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角度的角度，我自己想加一個小註解。大陸說「女權主義」，台灣說「女性主義」，但是台灣女性主義在某個時間點，大概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那個時候「婦女新知」有些人在談女性主義，而學院裡面的女教授基本上會強調「我們是女性的學者，可是我們不是女性主義」，把女性主義當作一個比較太過激進的東西，或者像李銀河形容的那樣：比較負面、女人想要壓在男人身上。但是九〇年代後期整個社會氛圍在改變，女性主義變成有正當性的時候，氛圍就變了。我有一次有幸聽到一位女性大學教師，我也不認為她是什麼女性主義者，但是她很洋洋自得的說，「我最近越來越喜歡女性主義這個名稱了」，然後她也喜歡自己被叫做女性主義者。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將來大陸會不會也有很多人跑出來

自稱「女權主義」，我覺得這個事情還不一定。還有一點我跟李銀河老師看法不太一樣，我不太認為現在的小三是傳統一夫多妻制的一個延續，甚至我覺得它跟吳敏倫那個時代講的二奶都有斷裂。我認為小三是一個新鮮的現象，因為小三也是個泛稱，可能是小四、小五，而且小三還可以指涉男的，不過這個「男小三」可能跟婚姻裡的妻在一起，或是跟夫在一起。因此我倒覺得小三指向了一個更新鮮的現代、情感、愛情、性的流動，而且持續在婚後繼續發生。現在台灣電視劇「犀利人妻」所處理的，比之前「花系列」電視劇呈現的又不太一樣，反映的是一般人會說是情慾流動、情慾解放這樣女性情慾大膽表露的現象。那麼在男多女少的狀況裡，小三是否會受到譴責呢？我覺得李老師您又忽略了一點，那就是說，我有小三，並不代表我自己不是小三，而且「一三」還有一「三」高，「三三」相連到天邊。所以它反而可能打破某種一夫一妻制度，有很多的小三、人人小三、你小三、我小三，反而可以解決同志或者男多女少的问题。您覺得會人口失衡，我覺得這不一定。

李晶瑤：我同樣是針對李銀河老師早上發表的一些東西。李銀河老師支持同志婚姻合法化，但是強調一對一，然後接下來就連到關於生育以及性病傳播問題。因為在台灣脈絡，我們不會這樣子論述同志婚姻合法化，也不把這些東西當作理由，所以我自己腦中就為李老師想出一個解釋，就是因為兩地民情不同或者政治關係以及民主不民主，因此作出了讓步。另外，「分級制」代替「淫亂品制」，在台灣其實我們對於「分級制」有很多的異議和想法，也有人覺

得不要分級，因為分級這件事其實非常矛盾的。在台灣《賽德克巴萊》有很多殺戮場面，《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有裸體場面，這兩部片子被分為輔導級，可是有一部泰國片，女同志情節，最多也只到接吻，卻同樣被分為輔導級。所以我會擔心，如果將來淫亂品在中國大陸變成有分級制度，恐怕也會造成另外一個不同程度的壓迫。

劉人鵬（主持人）：好，我們暫時到這兒，請台上幾位先回應。

王蘋：我只是想提一個想法，也許是補述一下前面自己亂七八糟講的東西。我覺得對同運而言，我們現在其實是在面對幾個跟「性別主流化」有關的議題。我自己必須誠實地承認，我和「性別主流化」的誕生有關，因為我的資歷很深，我有資格去性別主流化的場子擔任委員或者去上課，所以我還蠻瞭解那個體制的運作。我覺得同運在爭取伴侶權、婚姻權、生育權這些事情的時候，必須也同時解構婚姻、解構伴侶關係、以及在生育權裡面解構親權／親職。現在在性別主流化之下，一切都強調所謂的男女平等，它是用「性別」兩個字，但是實際上談的還是生理性別而已。在這個男女平等的原則之下，「任一委員會任一性別比率不能低於三分之一」，過去委員都是男性，希望生理女性進去，但是現在反過來了，因為女性主義者覺得只要是生理女性，人人都是女性主義者，所以委員會裡女的就蠻多的，結果男的就不夠了。男的不夠了，就需要男的，但不是什麼男的都要，也要做一些跟性別有關的事情，於是這個時候就出來了所謂的「在反父權之下新好男人很特殊的狀況」——就我的觀察，這種新好男人完全可以等同

於一種男人，就是「男同性戀」。

因為男同志有某種特質，這種「新好男同志」就非常容易被接納到性別主流化之下，這就讓我有點小緊張了。因為性別主流化不斷強調平等，譬如過去家務分工，男的不做家事，都是女的做，現在男的也要做，那些男同志都做家事，所以他們就進去委員會了。另外還有育嬰這件事，生育小孩、照養小孩，也需要願意照養小孩的男性進入。過去婦女運動長期針對「母職」質疑，以便讓婦女能夠自主出外工作，可是現在有一堆新好男人進來，就開始不談母職，談的是親職，可是這個親職如果不解構的話也很可怕。有一次我開了一個會，結果大家都在講，照顧小孩不能只有女的在顧，男的也要顧，談來談去，完全不質疑母職想像。現在這個還要擴大，要把新好男人放進來，大家一起照顧小孩，我覺得，一起照顧小孩的下一句話就是，我們要保護兒少。這當然講得有點粗糙，但是我真的認為這是一個危險之所在，目前新好男人這個選項出來之後，其實蠻多男同志會被吸納進去。我就在想，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我們討論的事情，就是說——怎麼樣在性別主流化裡面，面對同運可以往前的方向？也就是說，我們真的要同時解構婚姻、解構家庭、解構伴侶關係、解構我們對於生育權的想像、解構親權。這是我的想法。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對於資源的行使。昨天聽萬延海提到，在大陸，如果你拿國家的官方資源，你要批判它，常常得稍微自我退縮一下。我覺得我們可以問自己，我們可以拿官方資

源，但我們拿了官方資源之後，我們能不能繼續去罵給我錢的這個單位？如果我可以繼續去罵它，我認為我們這個錢就可以拿。可是我們拿了這個錢，之後我們又被這個錢綁手綁腳的話，我們真的要思考這個錢到底可拿可不拿。還有，我要回應那個剛剛問為什麼都沒有人發現這個會議的講員昨天都是純生理男，今天都是純生理女，我覺得這只印證了一件事情——這個會議是超越生理性別的。

何春蕤：我先回應議程的性別安排。每個場次都要找人來主持和介紹，這個人也必須要和主講人的領域有所接合，有所認知，在排的時候我們根本沒在想生理性別，排出來就是這樣而已。既然大家關心這個議題，我要講另外一個例子，我記得當年有一次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一個會議上，劉毓秀大發雷霆，因為性別的場次被排在最後一場，她上來後就把所有的資料摔在地下說，「你們根本不看重我們這種性別的議題，把我們放在最後一場」。可是如果排在第一場，她也會說你不够看重她，因為你把性別排在早上聽眾不太多的時候，等到後面聽眾比較多的時候，場次已經過了，沒人聽。你也不能排在中間，因為那就是淹沒了性別場次。不管怎麼排，只要想挑剔，都會是動輒得咎。也就是說，你要是只計算性別，那什麼狀況都可以挑剔，我就什麼都不想，什麼人適合主持就請來主持，就這樣而已。

李銀河：我說一下女權。「女權主義」這個詞在大陸非常奇怪，最早的時候，一說「女權」就說它是從西方來的，然後所有人就有印象，一個是這是一個非常異己的東西，再來就說它

是爭女的權，要打倒男的，好像要仇視男人，所以後來就把它改為女性主義了，好像就溫和了很多。即使是這樣，有一個婦女作家代表團到了國外講演，每個團員上台都事先說明，「我不是女權主義作家，我不是。」為什麼大陸會這樣呢？我覺得就是因為就像毛澤東說的，「婦女能頂半邊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現在則是反過來說，女同志能做到，男同志也能做到。這些人為什麼要強調自己不是女權呢？就是想說，我的成就是普遍的，是普遍標準的，不是因為我是個女的，所以好多人都會否認她自己是女權主義。實際上，如果女權主義定義就是主張男女平等，那麼實際上，男女平等一直是中國的國策，應該說，按女權主義的經典定義來說，所有中國人都是女權主義的，因為主流意識形態是女權主義的。但是，要是從全國婦聯來看，她們有一個特別的立場叫做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好多事上，她們都像妳們台灣很保守的立場，比如說反對選美，中國婦聯從來不做自己獨立的決定，唯一的一次算是有個性的就是在八九幾年的時候反對全國選美，她們主要的想法就是女的成為客體，她們反對。還有，她們絕對廢娼。我記得有一次我碰到全國婦聯的主任，她說現在有些奇談怪論，好像說婦女賣淫是性工作之類的，她絕對不能容忍。這是中國女權的來歷。

至於小三這件事，我覺得有兩個原則：一個，我反對的小三是男權的，就是說像過去的妻妾成群，中國男人就是這樣，我有錢就能佔好多女人，然後這些女人就在那勾心鬥角啊，就像「大紅燈籠高高掛」，每個人都去爭紅燈籠掛在自己的門上，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腐敗、非

常腐朽的。再來就是不誠實，那種背著妻子去搞另外一個，我覺得這是違反道德的，對妻子也是不平等的。除此之外，像甯老師說的那種情況，就有點像西方現在的「多邊戀」，「多邊戀」可不一定是「一男兩女，兩男一女，兩男兩女」，大家都是互相知情同意的，我覺得這就沒問題了，我是一點不反對的，這完全是一個新的人際關係模式。可是大陸的一夫一妻制特別主流，所有其它形式都是不能容忍的，我說「多邊戀」好話，在大陸多少人罵啊，特別不能容忍。

至於分級制，我剛才還跟老潘聊，台灣已經在考慮怎麼樣保護兒童的性權利，我們大陸連成人的性權利都還實現不了。淫穢品被抓起來，要不是槍斃，就是判多少年之類的，所以這個真的是下一步的目標，我們先要爭取把這個淫穢品法給去掉，然後大家成人消費品的需求才能正當的得到解決，而不是動不動就抓。陝西曾經有個「黃碟案」，當時也引起全國大討論，就是一對新婚夫婦在結婚當夜在家裡頭看黃碟，被鄰居報警以後，公安局就衝進去把人帶走，沒收了錄像機和電視，後來全國大討論公民有沒有在家裡看淫穢品的權利，最後的結局還是比較好的，就是派出所道歉了，據說還賠了三萬塊錢，因為他們把當事人嚇得有點神經病了。所以我說，我們現在才停留在這個階段，等我們爭取到這個，我們再說有分級制好還是沒分級制好。

嚴月蓮：我想，在香港要買房子，這句話不單單只是問姐姐，我想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沒資格買房子，所以做這個行業也不等於收入很好。還有就是經常很多良家婦女很有良心的也

非常有同情心的說，妳還是轉行吧。但是我經常說，她做得好好的，妳幹嘛叫她轉行呢？要是她每天都賺不了錢，那我們不需要問她，她自己也會轉行。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經驗，我做了女工很久時間，然後我做勞工工會的時候也會介紹勞動法，有去大學講工人的情況。有趣的是，第一，從來沒有人問我妳是不是工人，可是我做賣淫組織以後，去任何一個場合講姐姐的時候，都有人問我是不是姐姐。我記得第一次有一個教授聽了我講姐姐，她就過來問我，眼睛充滿淚光，抓著我問，「妳唸書唸到幾年級？」我就說我小學畢業，她就很憐憫的說，「喔，怪不得」。接下來就說，「我家欠一個保姆，妳要不要來幫我做？」我就覺得奇怪，幹嘛要我去妳家做保姆呢？她就是鎖定我就是姐姐，可是很不好意思，我都還沒入行。她會覺得，妳這麼站在姐姐的位置上講話，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妳就是姐姐。其實很多時候我跟姐姐一起去大學講課，姐姐就不被當成姐姐，反而我永遠都被當成姐姐，因為，第一，我夠老，第二，廣東話說「我夠慘」，慘的意思就是又老又好像睡不醒，很勞累。所以我經常需要說，妳搞錯了，她才是姐姐，我現在還沒入行呢。所以你們最好把腦袋裡面媒體給你的印象，這種刻板的姐姐印象，都像電腦一樣刪除。姐姐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她們有自己很豐富的生活，妳要跟她們來往才能了解。

何春蕤：我先講女權主義好了。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師承女性主義是很純正血統的，我是 Susan Gubar 的學生，很著名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寫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1979) 的作者

之一，我是她的學生。當時上完她的課以後，我就決心不要做女權主義者，因為在課堂上講女性主義的那種談話方式讓我覺得非常不舒服，我沒辦法接受「唯女人中心主義」，好像凡事都是因為男人不好，我其實對女生是很有反省力的。回台灣以後，在推動某一種思考的時候，我會說我是女性主義者，但是一九九四年出版《豪爽女人》以後，我就被說成不是女性主義者，這麼一來，我就常常說「我是女性主義者」，有時也說我是「feminist sex radical」性激進派的女性主義者。所以說，用不用這個名稱，主要是看我對應的人和他們所佔的位置。像我早上說，性自主，情慾自主、性解放、情慾解放，對我而言沒有差別，都可以換著用，但是對手往往會特別強調情慾自主與性自主有別，或強調性自主與性解放有別。在這種時候，我就會特別去講性自主和性解放，妳不愛聽的，我就越愛講，因為你不愛聽，就反映了一種排斥，而我就要挑戰那種排斥。所以這種因應著對方的位置而採取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概念，其實是我常常在做的事情，妳想要從字眼當中直接去推論我某個時候的某個立場，恐怕沒什麼太大意思。

剛才有提到親職、新好男人、新好同志，然後目前親職的論述也開始龐大起來，處處都在提醒，父母親一定要好好照養小孩啊，處處都很危險所以需要好好保護小孩啊，父母親應該共同的給孩子好的性別教養和正確意識啊。我小的時候因為爸媽都很忙，爸爸是軍人，每天上班不在家，賺的錢很少，我媽有時候會去做一些賺錢的事，不是賣淫，而是打麻將，賺一點小錢，晚上就可以加菜。當時我在無父無母監管的狀態下，很快就長成很會照顧兄弟姐妹的人，造

成了我今日組織能力很成熟，能夠面面俱到的做事情。因此我覺得父母親職做得不太好，也挺好的，我遇到很多朋友，父母親親職做得很好的，她們都叫苦連天，因為被父母看得太緊了。父母親看得緊，不單單是不斷監控妳，還有情感的羈絆，用很多情感的方式關心妳，讓妳沒辦法逃脫魔掌。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倒覺得我們還真不要親職太好，因為親職太好，有些孩子長得也不好，情感上永遠不太成熟。我們這些沒有被父母親看得太緊的人，長得也挺好的。

針對李銀河有關二奶、小三的立場，我會有點困惑，因為好像在和性工作相關的除罪化立場上有空間，但是二奶、小三就沒空間了。我倒覺得二奶、小三也是某種形式的性工作，二奶特別是，我常常把二奶視為「中國新興經濟之重新分配機制」，新興經濟起來以後，透過兩岸關係，鬆動在緊密監控的一夫一妻制度下形成的二奶經濟，讓經濟財富重新分配，讓有錢的人才能分一點錢出來。如果以經濟交換作為性工作的基本定義的話，二奶當然也是一種性工作，至於小三，不但提供性，另外更重要的內涵是情感，情感工作也是新的性工作範疇。如果我們追求性工作除罪化（其實我比較喜歡非罪化的說法），就是不該受人管，那麼二奶與小三為什麼要被要求一定要一百分之一百回報？性工作從來不要求百分之百回報啊，只要把這一次做的回報給我就好，我不要求你生命的一百分之一百。很多二奶、小三其實也並不希望百分之百，因為如果不要百分之百的話，她就可以做小四，做三奶，可以做其他你沒空的時候我就可以和別人發展的關係。所以用性工作角度看，二奶、小三、跟姐姐們，其實就是時代和階級上的表

現形式不同，在一定的政治經濟環境條件之下形成不同的關係吧。還有，小三作為流行的名詞，它已經開始包含很多不同的關係，不一定是長期的關係，也不一定是穩定的關係，相反的，它變成劈腿對象的另外一種常見的稱呼，所以小三包含了很多東西，不見得適合用百分之百的關係來做要求。

李銀河：我稍微回應一下，其實我覺得我反對小三、二奶，和我說性工作除罪化並不矛盾。因為我只是說性工作者不應該抓起來，不應該刑事處理，但是我覺得道德上還是有問題的，我是說那個男的道德有問題，因為結婚時候男的有個忠誠承諾的。我不是說這些小姐們道德有問題，問題是這個去搞小姐的，不管他是去搞賣淫，去嫖娼，還是去搞二奶，還是搞小姐，他違反了他的忠誠承諾。

何春蕤：有很多小姐也是已婚女性，她們也有忠誠承諾，她們也做性工作，可是你不會譴責啊。

李銀河：我覺得婚姻道德這個東西，妳可以在徵得同意的情況下做，這是可以的，譬如說妳去做性工作，妳丈夫同意，確實也有啊，在東北有好多丈夫帶著妻子去賣，這個就不存在道德問題。我覺得道德就是說，兩個人最初結婚時候的忠誠承諾，如果你違背了，當然多數情況下是男的違背，不管去搞小三還是搞二奶，他都違背了忠誠承諾，除非他徵得了妻子同意。我覺得如果徵得了妻子同意之後，那就沒道德問題了。

何春蕤：啊，吳敏倫要參戰了。

吳敏倫：是啊。這個問題講了很久了，我很想加進來。其實你們講得很好，只是李銀河最後這個立場，覺得因為男的沒有道德，違反了結婚時答應的一對一關係。但是我的立場就是反對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沒給人選擇，那個男的沒選擇，他不可以說我不要一夫一妻制，我要兩夫兩妻制，沒有人給他兩夫兩妻制啊！

李銀河：現在可以啊，現在有好多「多邊戀」。

吳敏倫：是，但是沒有合法化啊。所以我就是提出，現在要「多邊婚制」，讓這些關係系統起來成為婚制。成年人，管他幾個妻幾個夫，只要他們同意，四個人、五個人，他們同意就可以去政府申請結婚，五個人結婚也很好，政府作證人，然後給他一個義務責任，這樣就可以了。其實我一開始就提出這個，不是包二奶合法化。

王蘋：我只想攪局。我剛好最近聽到有個朋友在傳述一個台中房地產商講的一個業界的笑話吧，管他真假，就是台中的空屋率很高，但是還一天到晚在蓋房子，因為還是有人買，而且跟我們在講的這個有關。這是另外一個經濟，可能要叫「大老婆經濟」，或是「二奶、小三經濟」都可以，因為台中的台商很多，然後台商都包二奶，所以大老婆就要求，你在那邊包二奶，你就要給我一棟房。大老婆就擁有很多房，你繼續包，我就繼續留房，所以促進了台中經濟。我覺得這是一個攪局的話，但我覺得民間有些值得研究的東西。

潘綏銘：這局還要攪嗎？那我也攪一點點。在大陸有好幾個詞，最開始叫「婚外戀」，然後叫「情人」，然後叫「包二奶」，然後叫「小三」。小三跟包二奶的區別：小三是以破壞原有婚姻為目的，所以咱們討論我老覺得得弄清楚，在八十年代沒有這個詞，八十年代叫婚外戀，婚外戀是很極浪漫，很 romantic 的那種，所以現在怎麼變成小三呢，小三在大陸是很清楚，是以破壞對方婚姻為目的，如果不是這樣就不叫小三。還有一個政治名詞，叫做包養情婦，專門針對共產黨幹部的，抓到就要開除黨籍的。

甯應斌：我想回到李銀河剛剛講的中國大陸面對淫穢品的局勢，李銀河覺得有些事情要等到下階段才想，但是我覺得問題已經嚴重了。淫穢品早期在西方各國被查禁的時候，用的理由是「公眾不宜」，後來隨著女性主義女權開始興起，女人慢慢被承認是公民、有些主動性以後，查禁的理由就慢慢變成「婦女不宜」，因為婦女運動爭取主動性的時候跑到所謂受害者的角色上。但是等到女性主動力更強的時候已經不是性的受害者，甚至是「官人我要」的時候，就需要另外一個受害主體，於是查禁淫穢品的理由就從婦女不宜變成了「兒童不宜」。淫穢品的查禁經過這三個階段，我覺得台灣基本上是順著這個三階段，現在因為女人也要看 A 片、女人要色情，所以比較少說 A 片對婦女的影響，而變成說保護兒童。我覺得現在大陸開始在各省市都推動保護未成年這種話語，非常非常的積極，那為什麼「保護未成年」這個東西在大陸變成這麼積極的事情呢？當然是因為一胎化政策只容許有一個小孩，再來就是現在大陸整個階級都

分化了，以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你沒有一個階級再生產的問題，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大家都在想怎麼把小孩送到上升的位置變成中產階級，或者妳現在已經是中產階級了，妳就要想怎樣維持你孩子的中產階級位置，這已經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使得父母對於未成年的問題更加重視。台灣的經驗是，淫穢品的罪沒有廢掉，反而在之上再去分級，等於就更一步的去箝制，所以我沒有李銀河這麼樂觀，大陸淫穢品的罪未來也許量刑會輕一點，但是我很懷疑會廢掉然後再來談分級，比較可能的是就在這個基礎上再講分級。如果今天提倡分級，那我們的理由是什麼？最現成的理由就是要保護未成年，那就剛好融入了現在這種保護主義的話語，然後這個話語繼續發酵，它影響的不只是淫穢品，而是更全面性的，我們現在台灣看到的就是我們一直在提醒的——性別政治的年齡轉向會重新把女人趕回廚房、趕回家庭，然後在性上面全面控制。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趨勢，就算要談淫穢品分級，也必須要有另外一種理由，如果這是個抗爭點的話。

丁乃非：我有點想回到之前王顯中談的女性主義意識的一個過程。我剛剛也一直在回想，至少在台灣，我記得在八〇年代末期、九〇年代初，那時候我記得在「婦女新知」的氛圍，其實是走出婦女新知的門，人們是不敢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這跟剛剛專制獨裁之後解嚴的氛圍是相關的，也就是說，女性主義其實被看成是要推翻專制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說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有點是洪水猛獸。然後學院更是不要跟女性主義有任何關係，那個時候我們

雖然在學校，但是完全是分割的兩個世界，學校裡頭當然有女性主義者，但是慢慢到後來女學會已經開始有了成果，已經比較體制化了，女性主義才開始變成一個擴散的符號。在擴散過程中，我覺得剛剛王顯中講的很重要，很多激進的部分就開始消失，這就是王蘋說的，在「婦女新知」內部的歷史如何開始越來越有壓力想要接合一個想像中的大眾，而這個想像中的大眾的定義其實是狹隘化了台灣那個時候所有的聲音。這個接合想像中的大眾過程裡頭其實就切掉了一些激進的連線，台灣本來左翼激進的第三世界連線非常微弱，很不容易才有一些些持續的聯繫，包括一九九〇年前後倡議的人民民主。我就很想問李老師，李老師剛剛講的大陸婦聯聽起來就是國家女性主義，而且它真的名副其實就是開國的國家女性主義，那是不是有像王顯中剛剛提的，就是有相對於國家女性主義、可是又銜接了某一種國際第三世界的一種連線或關切底層的一種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的聲音？

李銀河：我簡單回應一下，大陸有一個叫李小江的，好像試圖搞一點跟官方不一樣的女性主義，但是我覺得她跟官方的區別到底是什麼，不是特別明確。官方的就叫做「馬婦觀」，我們叫作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然後當時確實有人批評她，因為她好像是另外一種異類的，但到底她是主張什麼，我不是太清楚。我的印象裡，她就是說，女人要有女人樣，要有女性氣質，就說我們過去幾十年都說「男女都一樣」，男人能幹活，那女人也要下礦山、下礦井，跟男的幹一樣的活，當公車司機之類。她說女人的特點都被否定了。我聽上去覺得她是主張比較本質主

義的那種，就是我們女人要有女人樣，要強調女性的價值。

劉人鵬（主持人）：真是欲罷不能啊，不過我們真的已經超過太多時間了，這次的會議就到此告一段落，我們下次再見。

